

费孝通文集

第十一卷

群言出版社

C53
79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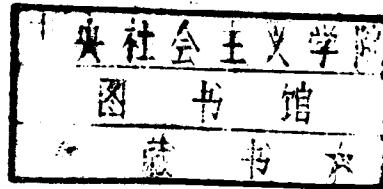
202335

费孝通文集

第十二卷
1990 ~ 1993



201028850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文集 第 12 卷

/费孝通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10

ISBN 7-80080-252-3

I . 费…

II . 费…

III . 费孝通-文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8050 号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深圳时代设计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889 × 1194 毫米 32 开本 15.75 印张 5 插页 36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深圳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G · 145 定价:29.00 元



90年代的费孝通

DI23/12

编者的话

本卷收录的文章写于 1990 年初到 1993 年上半年。这段时间，作者的观察和思考，依然关注着中国城乡的发展和贫困地区如何走上富裕之路。一如作者年轻时立志要“摸索出一条科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的道路”所言，这个时候，八旬老人在总结自己拨乱反正后 10 年的学术追求时，以《行行重行行》为名，出版了一本别具一格的著作。在此期间，作者应苏联科学院邀请访苏，后又赴日本接受亚洲文化大奖；其间，《对“美好社会”的思考》这篇充满人文关怀的文章写就，并于 1993 年底在印度“第四届英·甘地会议”上宣读。同时，《逝者如斯》等著作出版。

在文章的编排上，我们采取以写作先后为序。除对文章进行必要的校勘和对个别错讹的文字给以订正外，一般不作改动。

1999 年 5 月

文集前记

在我这一生即将进入 21 世纪之前,也就是在我走过 90 岁这个年限之后,我的亲友们建议把我过去一生所公开发表过的写作整理成一部文集,作为纪念。我同意他们的好意,但是我自己这几年有不少已预定的课题还要完成,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帮助他们做这项工作。我只能表示尽力支持他们而已,又只能放手和放权让他们去办。最近他们已经把这部文集初步编成,将要去付印出版,坚持要我在集前说几句话。我表示同意,所以简要的把我想在集前说的话写下。

我同意把我一生公开发表过的写作力求完整地编成一部文集,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在为一些愿意想了解我国 20 世纪知识分子怎样走过来的人提供一些研究的素材。我的一生从 20 世纪初期到它的结束,经过了 90 个年头,这段历史给了我这一生经历的内容。由于我自己喜欢写作,所以我也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一些文字上的痕迹,反映了我这段时间里社会对我所起的作用,同时多少也透露了这段历史时期里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写作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为一生兴趣的人,我以己度人,想到我身后也许还会有和我一样有此同好的人,我愿意把我要留下的这本文集提供他们做研究中国这段历史的素材。也想以此作为我对我一生所受社会培育的一些回报。

为了贯彻我这个意愿，所以我一再向负责整理和编辑这部文集的亲友们说明，我愿意授权他们尽力搜集和如实地处理我一生留下的写作，把它们保留下去，而且尽可能全部编印出来，有待今后读者的取用。

但在这里我也得作一点保留意见。因为我一生中有一段时期曾经被划为“右派”，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不得不写下一些言不由衷、不符合我实际意识的文字，就是那些被迫写出的“检讨”和“交代”。这些文字要作为研究当时历史经过的素材，是可以有用的，而且也可以说是有意义的，但需要如实地放进当时很特殊的和失常的社会情境之中去，才能明白其实在的意义。现在已事过 20 多年，我本人不容易，也不愿意重新记取当时的社会情境，而这些文字又必须详加注释之后才能有用，如果用原文留给后人，不免会起误导的作用。所以我再三考虑，还是要求把这一部文字，作为另案处理，免于收入这部文集之内。我希望后来的读者们能谅解我提出这种保留的苦衷。我愿意在此声明这个保留意见是我自己作出的，我也愿意为此负责。

我同意编者以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来编排在文集中前后的次序，我认为既以提供研究素材为目的，所以为了便于追索我一生思想的发展和经过，采取按这些文章发表的前后来编排定在文集中的先后次序最为方便可行，但是事实上我是又有多题并进的思考习惯，不同题目的思想可以在同一段时间里参差进行。而且文章的完稿和发表之间又有不同的差距，我的文章又经常在同一时间里投向不同的刊物，发表时间和写作时间又不一定相符。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引起了文集编者的一些困难，不可能坚持上述的原则。同时也必然会使一般读者不能按文章编排的前后顺序来追索我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在文集的编排上还有一个引起编者为难的原因是我在写作上常采取化整为散又集散为整的方法。就是一个课题时常分作了系列的短篇写出，一般是在一个刊物上连续发表，积有一定篇幅，再编成一卷作为专集出版。凡是已经以专集方式出版过的一系列文章，我建议在本文集里还是予以保留使文章内容的连续性不要拆散。这里又发生了一个编排上的难点，就是那些已结合成专集的文章，各篇发表的前后的间隙中我又时常插进另一个新的系列。逢到这个困难，我建议这本文集的编者只好让前后为序的原则作出些让步了。

我要感谢本文集的整编者为这项工作所费的劳动和精力。我认为他们把分散在各地各种报章杂志刊物上的文章收集起来确已竭尽了全力。要想做到把我一生全部写作都搜集到手困难很多。我的记忆中早年有一些常发表我文章的杂志和刊物，现在已经因各种原因，无法找到了。又比如我最早投稿的《少年》还是友人从僻偏的图书馆里找到的，而当时我曾用“费北”的笔名在这刊物上发表的一些作品，却没有复制给我。又比如我在中学毕业时所编的《水荇》中发表的早年作品，还是友人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中偶然见到而复制寄我的。至于我在昆明学生运动前后所发表在许多街头刊物上的文章，为数不少，现在已搜集不到了。

最后我应当感谢这本文集的编者，他们不仅费了大力去搜集我散失的写作，而且又费了大力去校核所搜到的文章的复印件和原刊里的错字和失误。我嘱咐他们的一条原则是凡不属于显而易见排印上的错失，一律存旧。因为在这段虽则不算长的时间里，一般通行语文的用辞也有相当的变化。近时已不常见的辞汇，在几十年前会是常见的，而各人所用辞也存在着个人的习

性，所以现在看来不太顺眼的辞汇不宜改动。但在校核过程中确是发现不少出于作者的错失或疏忽，以致文章内容中有实质的错误，使前后所提的事实对不上口，甚至有矛盾，在数字上又有出入。这些错误应当由作者来负责的。我十分感激编者对我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能发现这些错误，使我在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把这些错误予以公开纠正。所以我请求编者凡逢到这类情形，应当按照原文不加修饰地予以付印，并加注说明错误所在，千万不可掩盖。已经公开发表的文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人生不可能无过，有过则改，坦白不讳，就对得起读者了。如果文章中还有错失没有揭露之处，祈望今后读者继续纠正。我即在九天之上，也将表示感激。

我一生写作自以为是比较随意和顺性的，秉笔直书，怎样想就怎样写，写成了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和别人的毁誉，这种性格确曾给我带来过没有预计到的人生打击，但至今不悔，而且至今我还是这样做。这是因为我相信用文字来写作是文明时代一个社会成员参与集体生活时应有的一种自主和自由的行动。当然一个人所有的思想无不受到当时社会的陶冶。他的一言一行无不受到社会集体藉以交流和进行集体行为的方式。社会集体就是通过其成员的言行达到它的创新和发展。所以一人的言行虽系个人之事，但也受到这个人所参与的社会，包括社会的历史遗产和当时群众思想的交流的塑造，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它表现社会的一面。我有时也乐于反复重读我过去的写作，常常以此作为我所处时代的一些纪录影片来自娱。我也希望能以此提供给读者同享。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同意我的亲友们提出整编这部文集的建议。在这部文集中也保留了一些我这一生未能实现的梦想，和具体的有关研究社会的思路和此生未获申论的课题。如

果此书能对一些后来者发生一点启发的作用，因而能继续进行发挥和发展，这将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了。后世不乏比我更有才能和学力、具备更好研究条件的人，希望能从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获得更大的成就，于国于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将为此而感到没有辜负此生的激情于地下。念人世的茫茫，愿以无悔无怨而告终。谨此写下这本文集的前言以告读者，并再次表示对编整和支援这本文集的亲朋友们的感激。

黄志田

1999年3月28日于柳州宾馆

目 录

缅怀福武直先生	(1)
农业现代化与深化改革	(4)
良好的范例	(13)
开发大西北	(15)
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	(22)
长江三角洲之行	(27)
人的研究在中国	(41)
认清形势,做好民盟的工作	(51)
结合实际 修正认识	(54)
近水楼台先得月	(62)
重访云南三村	(67)
红场小记	(83)
在人生的天平上	(87)
我们该怎么做	(93)
肺腑之味	(96)
榕城佛跳墙	(101)
几点意见	(106)
乡镇企业向前看	(109)
包头行	(116)
应该说是有点缘分	(124)
风雨同舟五十年	(127)

江苏乡镇企业的下一步	(138)
吴江行	(143)
无棣金丝枣	(159)
侨乡行	(163)
凉山行	(171)
志在富民	(185)
清华人的一代风骚	(194)
《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后记	(207)
关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些意见	(226)
乡土教材和社会调查	(230)
《行行重行行》前言	(234)
武陵行	(238)
加强智力扶贫	(256)
重访民权	(260)
民富则国强	(274)
从当地实际需要出发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276)
珠江模式的再认识	(279)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290)
孔林片思	(294)
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	(300)
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	(317)
出口、腹地和交通网络	(335)
沂蒙行	(339)
解放思想 奋发图强 做出新贡献	(357)
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361)
中国乡镇发展的道路	(371)
府书记的十大营养蔬菜	(374)

猴年辞岁.....	(381)
乡镇企业的新台阶.....	(384)
寻根絮语.....	(392)
沧州行.....	(402)
社会学重建的回顾.....	(413)
《史记》的书生私见.....	(416)
邯郸行.....	(420)
关于教育的思考.....	(429)
泰安讲话.....	(436)
肥城讲话.....	(446)
选好角度 发挥优势.....	(450)
展视中国的乡镇企业.....	(455)
对“美好社会”的思考.....	(461)
个人·群体·社会.....	(467)

缅怀福武直先生

犹忆三年前，福武直先生七十庆寿，我未能亲往祝贺，曾托友人赠诗相遗。有句：“海外访知己，暮年日益稀。”知己日稀，交情日笃。前年与先生晤谈于东京，恨时间之短促，以在北京再见相约。及时先生果来华，而我却适因事外出，无缘践约。去岁噩耗传来，先生年幼于我而竟先我辞世，伤哉！今年初获若林敬子女士来信，谓先生生前友好倡议集文为纪念，承不弃，嘱为文参与。忽忆前诗，情不自禁，即韵续咏：“君竟先我去，羡尔事有继。”

人寿原不应以天年为限。作为生物的个人固然各有其自然的限度，但人之所以有异于其他生物者，即在其天年之外犹有可离其肉体而长存的社会影响，亦即古人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为人师表就是立德，培育人才就是立功，著书立说就是立言。此三者固然都是个人的行为和思想，但一旦为社会所吸收，成为众人之事，就超脱了个人的天年，而得与社会长期共存。先生离世不久，而国内外社会学界同人念念不忘先生的道德文章，各以其所得于先生者发抒新见，著文立论，不仅表达后辈的思慕，亦所以发扬光大先生的成就，扩大社会影响。这岂不是后继有人之明证，怎能不使人羡慕？

我冒昧称先生为知己，实际上直到 70 年代末才有缘亲聆先生的教导。当时一见如故，友情自溢。何以故？其出于我们两人有相通之处乎？念先生在社会学上的造诣始于在中国华北、华中的农村调查。于大体上相当或稍前的时期，我亦已在中国华东及

西南做农村调查。但两人关山重隔，战火弥天，各从其事，无由相识。事后互相对比在立论观点，为学方法上我两人却又何其相近。这岂能说是历史的偶然。

我经常自觉一个学术工作者尽管主观上总是力求独立思考，推陈出新。但盖棺论定，总是难逃于时代的大气候。近代的东方正处于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时期。中国如此，日本亦非例外，迟早和速度不同耳。一个以研究东方社会为志的科研工作者，不仅其自身的生活，其所接触到的社会和其所关怀的人民不可能离开这个主流。我和福武直先生之所以异地而同流，盖出于同一时代，抱有同一志趣的缘故。

我们都是东方的社会学者，都受到了近代社会科学的训练，都明白只有从在社会中生活的众人的具体行为和思想里才能认识到这些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形态和轨迹。这也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的基本条件是在掌握可以证实的调查资料。在传统的东方，众多的人口聚居在从事农业的村落中，这又决定了要了解东方的社会很难不从农村入手。在这些农村中一般都缺乏现存的可靠的调查资料。于是，亲自从事农村调查成了研究东方社会的学者入门的必修课。这个客观的道理，使福武直先生和我不约而同地都走上这一条从农村调查作为社会学开始入门的路子。

先生的中国农村调查只是他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他从中国的农村调查之后接着就跨出中国的范围，进入日本和印度的农村社会研究，更进一步又跨出了农村社会的范围，进入了东方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发展的整体研究。他70年代著成了《现代日本社会论》，80年代又出版了英文本的《当代日本社会》。这些都是从点到面，从基础到上层建筑融会贯通的综合性理论研究，基本上完成了他在社会学方面独到的体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是“实证要受理论的指导，而且要上升为理论，成为实证的理论。科学的正确形态只能是这种实证的理论。”他号召社会学工作者“我们必须要求我们的科学勇敢地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①

从实际出发分析现实社会，用以指导人们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也正是我毕生所追求的学术目标。福武直先生在这条道路上用了比我较短的时间而取得了成果。我自己则由于无端损失了 20 个年头，即使幸而在垂老之年有机会急起直追。但时不再来，夙愿看来已经难偿。而福武直先生一生的成就却替我这类抱有相同志向的人提供了典范，使我们对这条为学之道更具信心。

更值得欣羡的是我上边已提到的福武直先生在 60 和 70 年代中培植了日本社会学新一代。在先生的暮年已看到这大批幼苗茁长成材。先生不仅身体力行，建功立业，而且后继有人，使先生所创导之学日见光辉，使后来者得以理解东方社会怎样从传统社会中脱颖而出，为 21 世纪全球性的社会做出贡献有了指望。在这些方面，我只有心向往之而自叹难追矣。

在我和福武直先生最后一次分手时曾恳请先生遴选 10 本日本现代社会学的代表著作译成中文，使先生所培植的一代日本学人的著作能不受文字的限制流传中国。不意此事未成而先生已归道山。我诚恳希望中日两国社会学界的同人为纪念先生对两国学术交流的挚深友谊而努力完成此约。

个人的天年总是有限的，但一生所提供之人类的精神贡献，则像播扬在人间的种子，到处会生根茁长。后继有人，我相信福武直先生是可以含笑九泉的。

1990 年 1 月 20 日于北京

^① 《社会学界的现状与未来》转引自《国外社会学参考资料》中文本，第 56 页。

农业现代化与深化改革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四五千年前，在东亚这块土地上人们已经具备了耕种粮食作物的基本技术，使这块土地能继续不断地繁育众多的人口，并发展了以农业为基础的高度文明。直到目前，这块只占全球 7% 的耕地还能负担着占全球 1/5 以上人口的生活资料，基本上达到粮食自给自足，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事实。但是为此中国至少有 80% 的人从事农业劳动，其中绝大多数还是以农业为其生活的主要来源。近半个世纪以来，人口不断迅速增加，耕地却没有相应地扩大，如果农业技术和体制不能随着形势的需要做出适当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基础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这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农业体制已经有过几次巨大的改革，在农作物品种、水利、能源、操作等技术方面也有了很大改进，粮食产量是不断上升的。1952 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接着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形式，全国农民都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这一系列农业体制改革调动了农民在农业上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发挥了集体力量，兴办了种种服务于农业的建设设施，特别是大搞水利建设，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由于人民公社制度中存在着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经营上的脱离群众，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到 60 年代，限制农民的多种经营，提出了“以粮为纲”的政策，严重干扰了农村经济的发展，